

# 露娜的故事（下）

## ——印度阿萨姆邦城乡考

○ 马宇歌

### 拉克普镇——田园诗下的危机

剧烈颠簸之中，我被露娜叫醒，“到拉克普了，快准备好，马上下车！”我昏昏欲睡，透过窗外的浓雾隐约可见几株槟榔树。不一会儿，我们就被长途汽车撇在了清晨六点的乡村公路上。

环顾左右，雾散开的地方，一座座小巧的乳黄色房子掩映在墨绿的芭蕉叶中，小村静谧犹如梦境。乳白色的浓雾一头，露娜和一个骑摩托的男子拥抱着在一起。许久，才招手叫我过去。我终于见到了她的丈夫，那个让她魂牵梦绕、抛下一切去追随的人。拉杜尔很害羞，不会讲英语，只是微笑的看着我。那真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农村青年。

露娜叫拉杜尔先用摩托把我送到家里，再来接她。我坐在拉杜尔的摩托后面，穿过村子崎岖的小路，露水打在脸上，四周是新绿的农田和热带植物。我们突然拐上一座竹子搭的小桥，一颠一颠过了河，眼前便是一座院落，一位黝黑的赤脚老人正赶着两头

印度牛原地绕圈碾麦子。“这是爸爸，这是家。”拉杜尔用印地语对我说。

露娜丈夫一家人都不会英语，我们用简单的印地语交流，他们日常都说阿萨姆本地语。家里的院子很宽敞，前院是两层的粮仓和储放农具的棚子，后院是厕所、井和晾衣竹竿。房子是一层的，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三个大卧室，由宽敞的走廊相连。屋里的陈设简洁、齐全，几乎都是必需品。拉杜尔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他和露娜小两口一家住一间卧室，平时吃饭都在一起。只有大儿子的媳妇可以下厨房做饭，露娜只能打下手。

露娜一到家就换上了粗布莎莉，卸了妆，头发包起来，摇身变成家庭主妇，和嫂子凑在一起，四处找活儿干，勤快得不得了。吃过早饭，丈夫骑摩托去了复印店、哥哥骑摩托去街政府上班。印度的行政系统分成三级，最高的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第二级是邦政府（State government），第三级是区政府（District government）。比如拉克普就是阿萨姆邦下的一个区，而比区再低的是街（block），是地方性的办事机构，权力不大，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拉杜尔的哥哥就在街政府负责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问题。

家里的年轻人都忙开了，我就跟着爸爸走街串巷。爸爸年轻时在军队做后勤工作，跑遍了印度，退伍后回家务农。因为他见识广，在村里很有威望。清晨干完农活，他在井边洗了澡，用一块白布包裹起下体，把剩下的布料顺手搭在身上，赤脚走上乡村小道。我跟着他，来到了另一家院落。

这天有个家族聚会，后院里的主妇们正在准备午餐。爸爸把我留给一群女人，自己走开了。只见十几个主妇围着几大筐新鲜蔬菜坐着，剥皮的剥皮、切



2010年3月，马宇歌摄于印度旁遮普邦（Punjab）阿姆利泽市（Amritsar）

块的切块，边说边笑。我一下被其中一个女人吸引了。她是这一家长子的媳妇，今天她家摆宴，雇来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做饭干活儿。

她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对自己美貌的不知晓。她就那样自然地站在井边，把儿子往腰间一跨，一只胳膊托住他的小屁股，两手伸在前面麻利地洗衣服。在一群粗俗的媳妇之间，她是那样随和地与人交谈，好奇地打量我这个中国人，羞涩地微笑。她的美有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虽被粗布莎莉和白头巾层层锁住，却从周围人对美的无知与无视中顽强地钻出来，在炫目的阳光下安静地流淌。

不一会儿工夫，她洗完衣服，井边换了一个刷锅的主妇，其他人也准备出一整筐切块儿冬瓜、一小筐芋头、一大筐圆白菜和青菜，只差水萝卜、胡萝卜和小黄瓜还没弄好。旁边一个男人已经挖出了两个烧柴的土坑，火升起来了，菜就要下锅。亲戚们陆陆续续到来，小孩子越聚越多，喊成一片，哭成一片，好不热闹。

我走到房子另一头，只见十几个家族中的男性长辈在院子空地上搭起了白布帐篷，围坐一圈，齐唱古老经文。空地中间是简陋的神龛。那天是一位家族先人的忌日，爸爸在其中主持整个仪式。他们坐在铺开的方形棕榈叶上，轮流向神龛磕头致敬、祈祷保佑先人，求福降于家族。每个男人都像爸爸一样围着白布，黝黑、精瘦、头发浓密，神情既认真又轻松，有时嚼一嚼槟榔、喝几口清茶。过了一会，女性长辈也零星加入进来。老人们齐唱的声音自然悠扬，在槟榔树围成的院子里久久回荡。

放眼望去，这座村庄满是绿地、庄稼繁茂。收割季节刚过，大片大片农田留着金黄色的胡茬子。几头牛散落各处，专心致志地吃草。收割之前，牛是不让下地的，以免坏了收成。印度教徒奉牛为神，坚决不吃牛肉，还有很多富人捐钱支持“护牛运动”。但农村里耕地、拉车都用牛。露娜家两头牛的背骨上，有浅浅的血痕，肩胛突出的那块骨头被磨得滴血。前一阵子收割季节，牛儿可能用的太狠了，现在终于可以休养生息一阵子。

阿萨姆地处热带，和云南处同一纬度。拉克普向北不到30公里是印度自称的“阿努那恰尔邦”，喜马拉雅东段南麓就从那里算起。而阿萨姆地势低洼，常年降雨充沛、土地肥沃，一年可种三季。但是，拉杜尔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家一年只种一季，就是7月雨季播种到12月份收割，其他时间土地闲置。个别人家种两次，几乎没人种三次。拉杜尔家有将近10亩土地，还只是村里平均水平。家里六口人，爸爸、妈妈和嫂子是全职劳动力，拉杜尔和哥哥在县城有工作，兼职做农活。从劳动力角度讲，一年耕作三次

并不现实。农忙时，爸爸会雇佣佃农，不过雇佣期只有一两周。

这里也有人把土地租出去给佃农使用，比如露娜自己家。地主拿收成的三分之二，佃农拿三分之一。但大部分人家还是习惯自己耕种。他们不认为闲置土地是浪费，反而相信这样可以让土地更肥沃。更主要的是，他们种地只为自给自足，一年种一次已够全家吃饱。无需劳神再给自己增加负担。而且，收割之后，还有大量后续工作，比如粮食加工、储存、喂养牲畜等等。

这里有地农民的生活实在是悠闲惬意。一天里，人们大部分时间喝茶闲聊、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乡村集会、乡亲之间走街串巷，只有一少部分用来干活。人们守着大片土地，全心享受着自给自足、阳光普照的日子。村里也有一些无地农民（landless farmer），生存境遇要惨得多，靠给人打短工过活。比如这几天收割季节刚过，有土地的家庭为了庆祝丰收，轮流请亲戚们来家里吃丰收宴，那些住在不远县城里的亲戚都会带着一家人开车来聚餐。无地农民就被雇来做饭。听妈妈说，一开始，每家都有大片土地，但有些人家孩子生得太多，土地越分越小，到最后，就只剩下一间房大小。

我很难把眼前这番富庶的乡村景象和露娜在德里过的那种穷酸日子联系起来。晚上，乡亲们聚在拉杜尔家看电视，阿萨姆新闻里播放独立组织ULFA领袖在孟加拉被警方追捕的消息。领袖在逃亡期间发表了一篇宣言：“我们要在阿萨姆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共和国，让所有人平等地生活。印度政府倡导的民主从来只是政客们的说辞……”哥哥说，他们同情ULFA，因为他们为穷人争取权利。

后来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认识了在阿萨姆从事乡村发展非政府事业的珍妮梁（Jenny, Liang）。她创办的NGO“蚂蚁”（The Ant—the action northeast trust）致力于帮助农民获得发展的技能与机会。她说，我所观察到的矛盾现象是因为，虽然农民自给自足的日子看起来很富庶，但由于缺乏交易手里没有钱。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洪灾、地震、劳动力损失等等，村民就会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而且，阿萨姆缺乏工业，经济落后，中央财政拨款少，政府既没钱也没能力有效帮助农民。所以，像她一样的很多社会工作者都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改善农民生活。

甘地曾在他阐释建国方略的《印度自治（Swaraj）》中说，印度自治的基础不在于发展高层政府治理，而在巩固基于传统的乡村自治，即“潘差亚特”（Panchayat）。每个村庄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管理者，实行自我统治，

维持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他不鼓励生产剩余产品进行交换，因为多余的钱财会滋长贪婪之心，破坏安宁生活的道德基础。

打破这种乡村安宁的是第二天下午，露娜父母及家人的到访。自从女儿和拉杜尔私奔之后，露娜家多次打到拉杜尔家来要人，还阻挠拉杜尔的生意。丈夫经常因此和她吵架。有一次我们正上课，露娜被老师叫了出去，原来是她舅舅找到了学校。舅舅想劝她，给她些钱，但露娜回绝了。她说她再也不想和那些无情的人有什么瓜葛。当天晚上，得知此事的丈夫就气得要离婚。这天，露娜和丈夫从外面回来就开始吵架，爸爸妈妈趴在窗外听着干着急。一会儿见她含泪跑出来，又躲回去。问她也不说。我猜一定是她家里人得知她放假回村，要来闹事了。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当露娜爸爸妈妈和三个表姐妹出现在村口的时候，露娜还是紧张得面色发白、浑身发抖，躲进卧室。当时，拉杜尔和哥哥都在上班，爸爸出去了。家里只有女人。妈妈把露娜一家请进客厅，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礼貌性地和我打招呼。露娜的爸爸妈妈一看就是县城来的，穿着、做派和浑身缠着粗布的乡下人很不一样。我想象中，两家人一见面就会短兵相接、大打出手。可事实上，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互相虽不怎么说话，但是乡亲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有说有笑，气氛并非尴尬。露娜的一对双胞胎表妹到卧室里去看她，她理都不理。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露娜被拉出来见父母。谁想到，一见面，露娜就放声大哭。这哭的威力使人群乱作一团。露娜的父母背向另一边，哀哀叹气。她的哭声如积蓄已久的火山喷发，气势如虹，令人畏惧，谁都不敢上前劝阻。持久的哭声又让屋子静下来，似乎所有人都在默默思索泪水的根源。

就在此时，我被另一个住在拉克普的朋友卢帕接走了，临时安排我在她家住一晚。拉克普是个小镇，露娜家的事人人皆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不是件值得宣扬的事情。毕竟，这里并不开放。

卢帕家在县城，她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大学老师，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家庭。这次她带了三个在尼赫鲁大学认识的德国留学生到拉克普。他们当天试图开车去“阿努那哈尔邦”，被边境上的警卫挡了回来。由于那是中印争议领土地区，警戒异常严格，非本地居民的印度人一律要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才能进入，外国人申请则要提前好几个月也很可能被拒。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从印度进入那里了。据说持中国护照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当做间谍抓起来。

卢帕这次带回三个洋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拉克普，所

到之处引起众人围观。镇上的亲朋好友都邀他们去做客，当晚我也跟着去了几处邻家。那条街住的都是老师和公务员，都有两层别墅、一个大院子。家里放着各种印度出版发行的英文刊物，有全国性的《今日印度周刊》(India Today)、《开放周刊》(Open)，也有东北部区域性的《今日东北部》(The Northeast Today)，还有阿萨姆当地的《阿萨姆通讯》、(The Assam Tribune)《阿萨姆时报》(Assam Times)等等。几乎每家都是两个孩子，全部在接受教育。

当时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新近的两起爆炸和独立组织ULFA领袖被追捕。我问卢帕的妈妈对此怎么看。这位政治学教授坚定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支持他们，谁会支持恐怖主义呢？我说，很多村民就支持，他们说独立组织在为穷人说话。她笑了笑，“穷人？印度所有政治派别都说自己是为穷人说话。结果呢？谁为他们争取到一点权益了？”我问她在两个月前的联邦政府大选中投了谁的票，她说，没有一个领袖让她满意，地方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领导力。但和那些主张极端主义、族群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方性政党相比，她还是把票投给了主张经济发展的国大党。“当然，国大党也是腐败成性。”她摇了摇头。

奈保尔(V.S. Naipaul印裔英国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著名的印度三部曲之二《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中，批判被歪曲的甘地主义。1975年他访问印度的时候，正值印度的民主危机，英吉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被冻结。他看到那些谈论着拯救印度的甘地主义者把贫穷奉为神圣，拒绝发展，试图用老旧的习俗代替国家机器。他认为，甘地思想在特殊时期唤醒了殖民地的自我觉醒，带领印度走向独立，却无法把印度带出贫穷，因为他把落后和不思进取合法化了。

奈保尔结束那次访问后15年(1990年代)，印度政府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开始直逼中国。但增长带来的两级分化又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污染严重、乞丐遍地的郭哈第和风景如画、邻里融洽的拉克普之间，也许奈保尔也会重新思考关于发展的论述。然而，露娜和她的爸爸、妈妈、丈夫以及丈夫一家，却从未怀疑过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穷人到富人”的理想。

露娜舅舅来过学校之后，老师们也知道了她的事情。一个老师听说我要去露娜家，和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印度传统是女方出嫁妆，露娜私奔过去，她父母嫁妆费不用出了，丈夫家却要损失一大笔钱。但他们两家还争得这样死去活来，因为露娜是他们走出拉克普的唯一希望。尼



马宇歌（左坐）在印度的泰米尔邦（Tamil Nadu）昆巴库那镇（Kumbakonam）调研，亲历印度全国上院执政党国大党议员、原印度石油部长玛尼·尚卡·阿雅（Mani Shankar Aiyar）（右坐）到选区听取农民质询

赫鲁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可以让一个出身贫寒者在大城市里立足。

第二天是周日，几个德国女孩儿要去教堂，我也跟着。没想到，拉克普这个印度教占主导的小镇里，竟有一座造型可爱的基督教堂，有完整的教会机构。那天，教堂里有四五十个当地人去听印地语弥撒，随着风琴唱圣歌。信众大部分是无地农民和镇上的穷人。

基督教在英国殖民时期传入印度东北部，当时整个东北部只有阿萨姆一个行省。基督教不仅带去了西方文明，给原始部落带去了一夫一妻制，更带去了丰富的物资。很多当地穷人因为可以得到一袋粮食作为奖励而改信基督。1960年代，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阿萨姆南部和东部的梅伽拉亚（Meghalaya）、那伽兰（Nagaland）、曼尼普（Manipur）、密佐兰姆（Mizoram）相继脱离阿萨姆邦，成为独立邦。至今，这些地方的基督徒最高达到了90%。

弥撒结束之后，嬷嬷们一定要请我们几个外国客人到她们那里坐一坐。我们被带到了教堂旁边的教会中学。卢帕和哥哥都是从这里毕业，这里是镇上唯一的英语学校，虽然他们并非基督徒。其中一个教名为托马斯（E. Thomas）的嬷嬷告诉我，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上学，大家一起求知生活、其乐融融，无须有宗教的划分。卢帕就说

她信仰所有的宗教，因为她爸妈是印度教、自己在基督教中学度过童年、还有一个穆斯林男朋友。

这里有11个嬷嬷，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20岁，来自印度各地。今年70岁的托马斯嬷嬷来自印度南部克拉拉邦，20岁时献身上帝，听从上帝安排四处云游，50年前来到这里传教。听说我来自中国，她激动地说：“我知道中国！1962年，我在拉克普，人们说中国人打过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吓得不行。后来又听说中国人撤走了。4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见到了中国人！”

## 回国

当天晚上（2009年12月14日），我离开拉克普，先坐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郭哈第，再坐3个小时飞机到德里，转乘国际航班回北京。

当我在北京感受着5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时，露娜和拉杜尔在四季如春的拉克普举行了迟来的婚礼。露娜私奔到丈夫家的时候，拉杜尔的哥哥和嫂子还没有结婚，按规矩，弟弟的婚礼不能在哥哥之前。露娜来德里上学以后，哥哥结了婚。她这次回去，村里懂天象的长者告诉爸爸，这几天是良辰吉日，宜嫁娶。一家人临时决定举办婚礼。办了婚礼，她和拉杜尔的婚姻才算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露娜的家人终究在露娜那次撕心裂肺的痛哭之后妥协了，答应停止他们的阻挠行为。但女儿的婚礼他们并没有参加。我时常想，对于当初只有19岁的露娜，到底是什么促使她做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三年的生活僵局、双方家庭的对抗以及经济上的窘境都不曾让她改变。这背后强大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放寒假回家重新投入到父母的怀抱，身处永定河引水渠与昆玉河交汇处的北京现代化高层公寓里，望着远处的玉泉山落日余晖，我不断回想着在广阔的阿萨姆城乡度过的短暂时光。和北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拉克普只是一个小镇，没有污染和城市的灯火阑珊。在那里，我享受到了许久以来不曾拥有的浩渺夜空、繁星璀璨。当时，我强烈地希望能够和心爱的人手牵手，一起仰望，容身其中。也许，当露娜面对都市的先进与繁华时，有着和我同样的感受。📖

作者现为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环境变化研究中心环境与能源专业在读博士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本文是作者2009年12月随她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专业（地理学）同班攻读硕士学位的女生露娜，利用寒假之机一起回露娜在印度阿萨姆邦的老家去实地考察后，写成的长篇纪实报告。